

略论孙中山与驻粤滇军的关系

——以陈炯明叛变后为例

王显成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 广东 湛江 524048)

摘要: 陈炯明叛变后, 孙中山与驻粤滇军一度采取互相依赖的政策, 两者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占领广州后, 尽管二者仍有互为依赖的趋向, 但矛盾逐步升级。为此, 孙中山不得不采取反思以往的革命、建立党军等政策。他们的关系之所以产生如此变化, 原因是驻粤滇军的军阀化倾向等因素。

关键词: 孙中山; 驻粤滇军; 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159(2010)02-0073-04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Zhong-shan and the Army of Yunnan garrison in Guangdong

WANG Xian-cheng

(History Department,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bellion of Chen Jiong-Ming, Sunzhong-shan and the army of yunnan garrison in Guangdong adopted the policy of relying heavily on each other. Their relationship experienced a short period of honeymoon. After guangzhou was occupied, in spite of the tendency of relying on each other, their conflicts gradually intensified. Sunzhong-shan had to rethink profoundly previous revolution and built the policies for the party and army. The reason why their relationship changed so rapidly lies in the army's inclination of warlordism.

Key words: Sunzhong-shan; the army of yunnan garrison in Guangdong; relationship

驻粤滇军早年是为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而创建, 后又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关于孙中山与驻粤滇军的关系, 学界已做了不少研究, 但这些研究偏重于单个人物研究, 很少进行群体性研究, 本文力图分析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与驻粤滇军的关系流变、成因及其影响, 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孙中山和驻粤滇军的关系。

1 孙中山与驻粤滇军关系的流变

1.1 短暂的“蜜月”阶段: 1922.6—1923.1

1922年6月, 陈炯明叛变。对于这个突如其来

的变乱, 孙中山一方面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与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另一方面, 为了维护共和政体, 发动了讨陈战争。战争中, 孙中山与驻粤滇军关系密切, 两者相互依赖, 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

为了依靠驻粤滇军, 孙中山采取的措施如下:

1) 给驻粤滇军将士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陈氏叛乱的目的是“盘踞与割据”,^{[1]521} 危害极其严重, “所至洗劫一空, 人民何辜, 遭此荼毒?”^{[1]522} 因此, 讨伐陈氏集团已是包括驻粤滇军在内的所有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2) 指明讨陈的方略: 联合反陈各军讨陈。1922年9月, 孙中山向

收稿日期: 2009-11-17

基金项目: 湛江师范学院校内课题“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

作者简介: 王显成, 男, 1966年生, 硕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远在粤北的朱培德提出：如条件成熟，则尽快夺取湖南，否则则与湘军等联合共同对付叛军。3)以滇军前途与国家大义激励和劝勉滇军。孙中山指示滇将廖湘芸：“且为滇军计，与其坐困桂境以待毙，孰若向粤以图发展？滇中贫瘠，孰若粤中殷富？争得失于一隅，孰若为国家扶正义？以此晓将士，将士想乐从也。”^[166]4)尽量满足滇军的合理要求。

这一系列策略对当时广东政局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它使孙中山尽快地恢复在广东的政权成为可能。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被迫流亡上海。而正是在驻粤滇军等的支持下，孙中山才有可能在半年后重新夺回政权，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其次，为以后的革命，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孙中山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拥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历史学家陈红民说：“驻粤滇军是广东各军中支持孙中山最坚决的。”^[2]孙中山也曾称赞说：“滇军在粤，方部讨龙，张部拥护军府，足慰尊注。”^[3]正是因驻粤滇军与其他军队的联合，才使孙中山度过了种种难关。再次，打破了唐继尧企图消灭驻粤滇军的阴谋，并使驻粤滇军得到较大的发展。

1.2 矛盾产生阶段：1923.1—1925.3

这一时期，孙中山在人事、军事等方面依然倚重驻粤滇军。而通过孙中山的提携，驻粤滇军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但其中的矛盾也日益凸现。

首先是政治理想的差异性。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军民分治的、民主的、法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军人必须服从、服务于国民党的主义，服从、服务于民主建国的政治目的。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颁布了《大本营管理战地地方民政条例》等法律来规范军人的行为。显然，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国民党领导下的军民分治的、民主建国的政权体制。然而这种体制实质上从陈炯明时代起，已被局部地破坏了。到滇军等盘踞广东的时候，它又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以广东现状观察，纯为武人专政时期……以此观之，省署一机关，直同赘疣。”^[4]按照孙中山的权能区分说，建立一个有力、合法、有效的政府是完全必要的。而在广东，军阀说了算的事实，导致了滇军等各派将领的跋扈与专横。很明显，它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其次是裁兵政策与滇军的矛盾。孙中山认为，要实现统一，必裁兵为工。那么，对于孙中山的裁兵政策，滇军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滇桂军领袖现均招募粤兵，故军额反而增加。”由于军额增加，而税收机关又为他们所把持，“故孙办事益形棘手。”^[5]再次，

在联俄、联共等方面的矛盾。驻粤滇军与孙中山之间的多元化矛盾，导致孙中山“信任滇军之心大减，转垂青于湘军。”^[6]

2 孙中山与驻粤滇军关系流变的成因

2.1 互为依赖的成因

首先，驻粤滇军成立的目的之一是拱卫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政府，抵制北洋军的武力统一政策，消除西南的亲北洋势力。这一使命并没有因袁世凯的毙命而淡化。相反随着西南地区与北洋军阀矛盾的激化，这一使命得到了强化。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使西南各省当局，人人自危……乃有西南重新团结之酝酿。”^[7]由此可见，西南的“联合抗直”需要正是驻粤滇军得以产生、维系、发展的根源。而驻粤滇军与孙中山的联合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其次，孙中山反抗专制，追求国家民主、富强的政治理念与实践，使他赢得了热爱和平、热爱民主的云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滇军将领卢师谛一生追随孙中山，屡立奇勋，对孙中山的品德尤为敬仰。1925年2月，孙中山因病溘然去世。病中的卢师谛对他的去世极为悲伤。他在中山先生的公祭仪式上，写下了一幅挽联。“不自谋不私怨不任术不好名不苟同不阿俗不巧不伐不屈不挠不以退为进一生勋烈只是光明真实作来论四十年革命艰难到底成功在此；有主义有方略有新思有远识有魄力有精神有义有情有勇有信有不杀之仁盖世规模纯从学历志行流出挈亿万众平民忧乐那堪继起无人。”^[8]挽联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也充分表达了广大滇军将士对孙中山出自内心的崇敬、爱戴的深情。正是这种情感使孙中山得到了驻粤滇军的支持。

再次，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凋敝的经济状况迫使一部分滇军把移驻省外、投靠孙中山作为谋求自身发展的最好门径。护国运动是由云南首先发起的。“滇以贫瘠之区，发此巨难，糈饷之出，至为艰巨。”^{[9]505}在该运动中，动用的军费达950万元，其中680万元是必偿的，这导致了“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面对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云南的实力派拼命地扩军。而这加剧了社会的贫困与混乱。为此，滇军把经略外省、捞取钱财作为其巩固自身、寻求发展的重要途径。陈炯明叛变后，依然滞留在广西的滇军自然不满足于该地的贫瘠与落后，他们

希望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孙中山的指示似乎给予了他们新的希望与新的期盼。

最后，唐继尧的大云南主义政策以及陈炯明的阴谋破坏政策加速了他们的联合。滇系首领唐继尧为了巩固其在云南的霸主地位，极力鼓动滇军向外发展，以实现其大云南主义。对于驻粤滇军，他也采取同样的政策。1923年绝望的范石生希望率军返滇，得到了唐的否定回答。由此，该军“乃大绝望，不复以友谊视之也。”^[10]驻粤滇军是一支没有固定地盘、没有稳定饷源，远离家乡，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复杂多变的武装。这只武装要想在西南地区，甚至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力，则不得不依靠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国人推崇的孙中山的提携与支持。而孙又没有自己的军队。此时陈炯明正力图勾结桂系对付他。正是这种双方的共同需要及长期以来的良好的感情才使该军一度成为孙中山依靠、倚重的对象。

2.2 矛盾产生的原因

第一，驻粤滇军的军阀化趋向。军阀的本质特征是军队的私人化趋向、拥有较为固定的地盘以及以武力干政。如滇军董翰臣部占香山县后，即委蔡鼎成为县长，赶跑原来的朱卓文。当时孙中山请求滇军入粤的目的是希望该军作为抗击叛乱势力的力量，从治粤的设想来看，滇军只能是一种辅助性力量，但是，后来滇军越来越难以驾驭：他们公然抓丁拉夫，杀人越货……致有“天怒人怨之象。”^{[11][12]}

驻粤滇军的军阀化必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第二，主客矛盾是激化孙、滇矛盾的又一根源。主客矛盾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与滇军等客军之间的矛盾。尽管孙中山极力缓和它，但这一矛盾依然十分尖锐。这从1923年1月的魏邦平被绑架事件可见一斑。该事件本质上就是外来客军要求分享、独占讨陈战争胜利果实的思想的反映。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广东舆论界普遍要求“粤人治粤”，极力反对滇军的干政行为。

两粤收拾，自应以“粤人治粤为依归，而在目前则协同奠定粤局，尤为切要之图。”^[12]总之，滇军的作用应是辅助性的，广东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广东人。

“粤人治粤”之所以产生，也是与当时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首先，它是20世纪20年代地方自治思想的产物，其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抵制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其次，它是对外来客军危害的

认识的必然性产物。广东自辛亥革命以后经历了龙济光等一系列的外来军阀的蹂躏，以至“变乱相寻，终无宁日。”^[13]而滇军一入粤，则导致了军事、行政的滇系化，赌博等的合法化。再次，这一口号提倡的必然结果是排斥、抵制驻粤滇军。“粤省军权，欲不至旁落，非得许军鼎立支持不可。”^[14]在军权决定行政权的民国时代，两广地区天然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它内在的权力欲的结合导致一个自然的结果：以往战功赫赫的滇军不可能也不易在政治上长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广东人内在的、明显的排外情绪是驻粤滇军所不愿，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这又影响到孙中山等的政治态度，从而使他与该军的关系恶化。

第三，北洋政府等的分裂、利用、破坏政策：驻粤滇军是一支非常复杂的武装。它既有民主革命的斗士，又有明显军阀色彩的干将。至于一般士兵，更多的是为了解决个人温饱问题而投军的。正是如此，滇军很容易被反动派分化、利用。

部分军人是唐继尧实现大云南主义的工具。如第三军师长王秉钧因“通北”事件臭名远扬。唐却对他“甚为优遇，并畀以参议职，允其在云招兵运粤补充。”^[15]这表明部分驻粤滇军与唐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民主革命，不如说是为了滇军势力的发展，为了大云南主义的贯彻与实施。直系的分化、瓦解政策包括：一是封官许愿，曹锟等为了达到分而击之的目的，往往采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来培养敌对阵营中的反对派；二是用金钱收买滇军。

3 孙、滇关系流变对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影响

滇军逐步从反帝反封建的依靠力量，转变为具有明显军阀色彩的地方性武装。它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具有较大的影响。

首先，依靠对象的局限性迫使孙中山反思以往革命的局限性：“南方各省的将军们扩充军队压制人民，他们的罪孽并不比北方军阀稍浅。”^{[16][17]}中国共产党人对滇军等的理性分析无疑给孙中山敲了警钟：以往具有革命性的滇军，已彻底地蜕变了：它再也不是革命派可依靠的对象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孙中山极为理性而又悲伤地承认广东民不聊生的现实。“间有骄兵悍将，不修军纪，为暴于

民……此尤足令广东人民叹息痛恨，而革命政府所由彷徨夙夜，莫知所措者也……广东今日此等现状，乃革命进行方法未善，有以使然。”^{[17]35}晚年的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在他看来，革命之所以失败，不是主义的问题，而是实行主义的方法问题。而这正是对自己长期以来依靠军阀、完成革命的历史的彻底性否定。从某种程度也是对驻粤滇军的实质性否定。尽管这种否定是非常痛苦而无奈的，但正是因为这种否定等才使他晚年思想发生质的飞跃。

其次，对驻粤滇军态度的明显变化。在联俄联共政策的感召下，在总结自己民主革命失败的教训后，孙中山对驻粤滇军改以往一味依赖、倚重的政策为：1）对滇军采取加强控制的政策。1924年8月，颁布了《中央督察军组织条例》，设立该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央威信”，该军由滇、湘等五军各派兵一团编成，直隶于军事委员会，各级官长应绝对服从它的节制调遣。很明显，孙中山希望通过该军来加强对滇军等的监管，从而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2）对滇军等各派武装采取利用、限制、平衡政策。1924年的商团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是当时滇军等各派武装病商政策的必然产物。那么，如何挽救秩序、挽回民心已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如何利用、限制滇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查此次商店罢市，系由奸人愚弄……现已分令各军长官严谕一律照常复业，应由该总司令转饬所部切实保护。”^{[17]564}孙中山的用心是良苦的，他不愿滇军太多地影响到他政权的声誉，同时又希望继续利用这支有光荣传统的军队。3）防止滇军过于强大，1923年3月，孙中山得知滇军私下在法国定购白药1.5吨、步枪2万、子弹200万，正准备从越南运往广西，他以政府名义要求阻止，后越南政府照办。

再次，将建立新型党军作为关键的措施。考虑到滇军等的局限性与危险性，孙中山意识到必须建立一种绝对由国民党支配、信仰国民党党义的军队。“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

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18]604}正是因认识到以往依靠对象的局限性，孙中山才把建立党军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24年8月，大本营咨议廖百芳函请孙中山从速练就一支新的军队。主张该军必须是“为特别的、为有主义的、为救国救民的，为革命党指挥之以贯彻三民五宪”的军队。他回信说：他的建议“实为先得我心。”^{[18]292}8月22日，令蒋介石招募精壮的兵士三千名实施训练，使成模范军，以为将来效力国家。可以说，广东革命政府最终打败陈炯明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取得北伐的胜利，不能不说是新型党军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6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 陈红民. 朱培德与滇军[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1）：128.
- [3] 孙中山. 孙文表明对南北和战的态度致唐继尧的密电[Z]//云南档案史料：第一期. 昆明：云南省档案馆，2007.
- [4] 毅庐. 省长问题之内幕[N]. 申报，1923-3-17（5）.
- [5] 铁崖. 孙中山地位复见陆危[N]. 申报，1923-03-17（5）.
- [6] 滇军要人王秉钧通北[N]. 申报，1924-01-08（6）.
- [7] 联名寒电之由来[N]. 申报，1923-04-20（8）.
- [8] 文俊雄. 卢师谛[J]. 民国档案，1994（4）：139-141.
- [9] 云南省志办. 续云南通志长编：卷二（中册）[Z]. 昆明：昆明出版社，1985.
- [10] 毅庐. 驻粤滇军表示回粤之意见[N]. 申报，1923-01-08（7）.
- [11] 东莞市政协. 孙大元帅东征暨国民革命军东征纪事[Z]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 [12] 无尘. 孙岑两派议员调和粤事电[N]. 申报，1923-02-24（7）.
- [13] 粤乱之剖析[N]. 申报，1923-01-21（5）.
- [14] 平云. 粤局现状与将来[N]. 申报，1923-01-24（10）.
- [15] 云南军政界近议[N]. 申报，1924-12-29（10）.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翻译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Z].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7]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11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8] 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第10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